

在中国土地上

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



在中国土地上

苏联顾问回忆录

(1925—1945年)

何智涛 李元吟等译 苜萝 兴权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中国土地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7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册

统一书号：11190·048 定价：0.84元

（限国内发行）

译者的话

197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在中国土地上》一书。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后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前来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关于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作者们从他们各自所接触的范围内存忆了当时中国社会情况，表述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文中有的记载与史实不符，如“回忆叶挺”一文中对南昌起义的记述，“往事追记”中对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交代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再者书中也有谬误之处，这里不一一指出，为保持原著面貌，行文中也未予逐条订正，只在最必要处加了简要的注释。敬请读者注意。

我们翻译此书，主要是为了向党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材料，作为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参考。因此删去了原书中史料价值不大的个别篇章和段落（如丘多杰耶夫为本书俄文版写的前言，卡利亚金的“民族统一战线”一文，“往事追记”中的最后一部分）。契列潘诺夫的“武汉战役总结”一文因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作者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一书中的章节完全重复，我们也将其删去。原书插图若干幅，因不甚清晰，我们均未采用。

1981年9月

目 录

- 在国民军第二军 А·Я·克利莫夫(1)
-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 С·Н·纳乌莫夫(11)
- 炮兵顾问的回忆 Т·С·鲍罗金(17)
- 在中国南方 И·П·舒万诺夫(29)
- 回忆叶挺 Е·В·捷斯连科(73)
- 在革命中国工作的一年 М·Е·沙斯(91)
- 蒋介石分子袭击苏联总领事馆记实
..... В·Т·苏霍鲁科夫(111)
- 在中国上空的空战 С·В·斯柳萨列夫(115)
- 在战斗的中国 С·С·别洛利佩茨基(155)
- 往事追记 С·П·康斯坦丁诺夫(221)
- 沈阳卫戍司令 А·И·科夫童-斯坦克维奇(257)

在国民军第二军

A·Я·克利莫夫

1924年底至1925年初，华北建立了所谓国民军。国民军的产生，一方面是各军阀集团内战加剧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反映。

1924年夏，又爆发了一场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錕）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的内战（即所谓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北京已驻有以加拉罕为首的苏联大使馆。应孙中山的邀请，以鲍罗廷和巴甫洛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团也已抵达广州。

1924年10月22日，吴佩孚的亲信将领之一冯玉祥离开了对张作霖作战的前线，突然占领北京，逮捕了总统——直系“文职”头目曹錕。同时他还把受直系奉给的前清逊帝溥仪^①逐出禁宫。冯玉祥声言转到国民党方面，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的军队主力据有京畿和内蒙，号称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的另一个军团由胡景翼将军指挥继续南下，赶跑了河南的吴佩孚残部，驻扎河南，称为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成了这个省的督办（军事省长）。孙岳指挥下的部队折转西向，把吴佩孚逐出陕西，成为国民军第三军。

1924年11月初，各派军阀会议，暂时结成同盟。在北京组成了代表张作霖和冯玉祥两派的联合政府。双方公推安福系首领段祺瑞将军任执政。由于冯玉祥的力主，段祺瑞不得

不考虑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和孙中山的巨大声望，而同意邀请孙中山来北京谈判和平统一中国问题。拟定召开特别的所谓善后会议，由国内所有的政界名流参加。

就在这个时候，即1925年1月初，我来到北京，立刻就见到了早在1922年就已在中国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见到我们大使馆的武官格克尔②。

加拉罕③很快就接见我，并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从事的工作和我参加过远东国内战争颇感兴趣。似乎还顺便检验了一下我对中国的知识。过后，加拉罕建议我去河南，到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当政治顾问。他说，大使馆对胡景翼和国民二军的情况都不太了解，这个军在几个月前去河南追歼吴佩孚的部队。

加拉罕说，胡景翼④曾去过他那里，要求派政治和军事顾问。他说，关于军事顾问问题，暂不好解决，因为我们不了解胡景翼的军队。又说，你们去后的任务是详细了解河南状况，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一般的不要干预中国事务，只是在别人有所要求时，才可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中国人采取我行我素的态度，也不要气馁。

大约在这次谈话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格克尔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我同格克尔和翻译瓦西里耶夫三人一起驱车离开大使馆。上哪里去，我不知道。汽车很快就到了北京站，一直开上月台，停在最后一节车厢旁边。我们走进车厢刚刚坐定，汽笛长鸣，列车就开动了。在车厢里，我认识了将和我一同到胡景翼部队去工作的所有同志，他们当中有一位姓方〔音〕的共产党员，是奉李大钊之命和我们一起出京，到国民二军去工作的。

早晨，我们通过一座大木桥，跨过黄河，到达郑州。事

先通知我们说，司令要亲自来迎接我们。

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位肥胖的将军。此人就是胡景翼。他和我们寒暄后说他要到洛阳前线，也邀我们顾问团一同去。格克尔、布拉依洛夫斯基和翻译瓦西里耶夫去了前线，我和其余的人继续上路到开封胡景翼的司令部去。这样我们就开始在国民二军工作了。

首先我们决定了解一下司令部的工作和准确地弄清战事情况。事实上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一切要靠传闻办事。过了两个星期，我的同事来说，到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一无所知……当时，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前线弄清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准备好了专用列车，我可以到前线去了。车站上熙熙攘攘，有商贩、妇女，有提包袱的姑娘，还有许多外国传教士。车走得很顺利。但是，到了郑州后，车不能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出了事故。

和胡景翼的司令部联络通了以后，我请顾问接电话，随便哪一位都行。半小时以后，格克尔来接电话说，国民二军打败了吴佩孚的军队，今天就可解放洛阳^⑥，顾问们即可从前线归来。格克尔建议我继续乘这次列车到出事地点，到时候，他们由西边赶到那里。

半小时后列车开动，向西驶去，沿途几乎是一片荒凉。我和共产党员方某同行。到了出事地点，我们的同志改乘我们的火车，一同返回郑州。郑州车站上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有仪仗队、乐队……

在路上，格克尔告诉我军事行动的情况。士兵要“武装”上雨伞。午饭和睡眠时间，交战双方信守不渝。炮火只能在暴露阵地发射。把大炮推出来，向敌方射击一通，然后再拖回去加以隐蔽。

格克尔幽默地讲述了流言在打仗过程中的功效。双方在洛河上对峙了两个星期。胡景翼的部队据守河的此岸，敌军在彼岸。河上仅有一座铁路桥。这座桥未经炮轰，也未毁坏，可以通过此桥发动攻击。但双方对发动攻击都下不了决心。一方散布流言说，我们将在某时过河。对方不甘示弱，放风说：我们也要在某时发动进攻，我们的力量更强。就这样彼此恫吓。哪一方先被吓倒，哪一方就退却而去，然后就是相安无事。

格克尔终于忍不住了，建议召开军事会议。“我对他们讲，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这样做：压制火力点，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桥冲锋，过桥打到河对岸去。”于是，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带兵？格克尔自荐说：“那有什么，我去也可以！”胡景翼很尴尬……部队在炮火的轰击冲过桥去。敌军逃遁。

占领洛阳以后，胡景翼设宴招待我们。宴会上笑话百出。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一下就听到了“上帝，佑我沙皇”的乐声。我们站住了。胡景翼看到我们局促不安的样子，弄清原因以后，差点没有把乐队砸了。事后，他向我们表示道歉，说他命令找俄国国歌，可他们找到的却是这玩艺儿……他们没有《国际歌》歌谱，我们答应送给他们一份。

胡景翼为人怪癖，爱做怪事。他从不忙于做决定。有一次在进餐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向他报告事情，而他却在假寐。看他那肥胖的身躯，这倒不足为奇，更何况是早晨五点钟。事后发现，这在他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每遇棘手的事，都要做出睡着的样子，而当部属走后，这位将军立即就会睁开眼。

胡景翼周围有一批传教士。有一次通知我们说，督办想

为自己的外国友人举行宴会。届时我们去他的官邸，出乎意外地在那儿遇到一大群人，有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传教士，共六十来人。

后来才知道，这些传教士很想知道，我们是何许人。是布尔什维克吗？有一次直截了当地向布拉依洛夫斯基顾问提出这个问题。他戴的菲斯卡帽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问及他时，他沉默不答，突然一个传教士说，这都是土耳其人！就这样我们成了土耳其人。

胡景翼常来看我们。他对一切都有兴趣。有一次来了，大发雷霆。翻译瓦西里耶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胡景翼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帝国主义者这些畜牲？他们的女人用香精洗澡！”后来知道，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份广告。这份广告上有一个香水瓶，一个女仆向浴盆倒入少许香精。于是，他得出结论，西方的富人用香水洗澡。

我在国民军第二军期间，遇到了农民运动问题。这是1925年的3月。关于农民运动，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使提出，也不过是泛泛而谈，可是，由于下述机会我便具体地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红枪会”^⑥在河南的活动很活跃。方某好象给我讲过，有一次，红枪会员们占了豫西的一座小城镇，此前那里驻有国民军第二军的一个营。看样子，士兵们对老百姓欺压得很厉害。最后营长出来收拾局面，俘虏了一些红枪会员，并开始审讯他们。

一个农民起义者当着士兵们的面说他刀枪不入：“我打了二十年的仗，可子弹从没有碰到过我”。

营长问道：“这么说，子弹打不死你啰？”他答道：“打不死！”营长端起毛瑟枪就是一枪。当然一下子就打死

了。这以后似乎红枪会员们相信子弹还是能“打死”人的。营长当时就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告诉他们应当怎样擦拭武器，保养武器，说那样准“打死”人，等等。后来他又转向另外一些红枪会员说道：“看，你们上了多大的当。”红枪会员都很窘。忽然又一个人走到营长跟前，声称他也是刀枪不入的。“刀枪不入？！”为了要彻底“说服”全体人员，营长当即把他给毙了。

得知这次枪杀后，我在见胡景翼时对他讲，作为国民军的一个领导者，怎么竟至不去保卫老百姓，反倒枪杀他们呢。胡景翼起先还不相信有这等事，于是我指出了出事地点，并且建议他去核实。

事情得到了证实。胡景翼把营长喊来，又把军部的人都召集拢来。营长来的时候还满心希望受到嘉奖。他报告了事情的原委。胡景翼听着听着，然后便字字句句学着我的话说开了：“你为什么枪杀老百姓？真给国民军抹黑！你应当保护谁的利益？……”说呀说的……把个营长说得发起抖来，一下子跪倒在地。胡景翼命令枪毙他。当我知道由于我的干预而产生的结果时，我感到很不好受，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1925年的5月1日即将来临。正在准备过节。方某的积极性很高。这时在郑州各企业的工人中间已开始成立工会基层组织。这段时间我到处跑，跟工人们接触。也有过去的，1923年间被解散的工人组织^①的代表来我这儿。我们谈论工会，关于成立工会和庆祝“五一”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也应该表示出我们工作的成果。

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人告诉我，警察局长向胡景翼报告，说工人们准备“五一”节罢工。警察局长过去曾给

吴佩孚当过差。当他报告了胡景翼之后，胡就说：“我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当时警察局长想给自己留个退路：“且慢，你还是跟俄国顾问谈谈。工人们常去找他……”

督办有一次到我这儿来谈起此事。这是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他对我说，工人们“五一”节要罢工。“但是我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那时我回答他：“您给他们点什么厉害呢？想证明您是个一般的军阀吗？”我于是给他讲了我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纪念“五一”节的，解释了“五一”节的意义。

胡景翼在跟我谈过话之后声称：“我要下一道命令，让所有的人五月一日都罢工！”我表示反对：“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要是他们愿意罢工，就让他们罢去；不想罢工的人，就让他们不罢工，什么命令都不需要发布”。最后他没有发布命令，但警察局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对游行示威者。开封、郑州与河南的许多地区都组织了“五一”集会。

郑州附近有一家以女工为主的缫丝厂。我得知那里已经开大会了。有一个国民党左派在讲演。他是留法学生。他一边讲，女工们一个劲儿地鼓掌。我问方某，为什么老鼓掌。他皱着眉头很不乐意地作了解释：讲演人说，妇女们在家里是奴隶，这是不应该的。她们就是为他这番话鼓掌。

后来又鼓起掌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原来是：不要裹脚，否则脚就变残了。他用这样的口气足足讲了不下一个小时。他结束讲话时，又爆发起一阵掌声，然后大会主席——一位妇女站起身来宣布，现在由你们大家都认识的某女工讲话。

听众报以掌声。一名瘦小的、谦恭的中国女人站了起来，向主席团鞠了一躬，又特别朝那位国民党左派也鞠了一

躬。她讲了一分半钟的话。她是那样地温顺，那样地谦恭，可她的讲话比那位国民党左派的演说却更胜一筹。

她说了下面一席话：“刚才那位讲得很好（说了那位国民党左派的名字，又朝他鞠了一躬）。我不是演说家，我不会把女人的命运描写得那么透。我只想说几句话。让我们一天干八小时活，再多发点工资就行了”。可你们听听罢，这以后的一片掌声！

……1925年的4月初，完全出乎意料，胡景翼死了。他在打麻将时，手上深深地扎了根刺，几天以后他突然身患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喊来了几个他的外国传教士朋友，其中有一名外科大夫，建议他作手术，手术后由于血液中毒，将军就亡故了。

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中国北方的革命民主运动，都是巨大的损失。胡景翼的一生盛衰荣枯，曲折多端。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参加了农民的“白朗起义”^⑥。后来又陷身绿林，被当局逮捕入狱。1921年冯玉祥救他出狱，起用了他。胡于是平步青云，直到当上了河南督办。

胡景翼的丧葬延续了数日。随后灵柩运往郑州。我护送灵柩。当时是人山人海，因为照中国的风俗，死亡能使众人和解，所以连各式敌人也都委派了代表。当列车载着灵柩徐徐驶近郑州时，乐队奏起了……狐步舞曲。参加葬礼的传教士们喜笑颜开，甚至合着乐曲的拍子手舞足蹈起来……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胡景翼之死确是一大损失。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加拉罕，剩下的领导人中我们应当指靠谁？他答道：岳维峻^⑦。岳的那个师驻扎在洛阳附近。这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决非政治人物，虽然他是胡景翼的知交^⑧……

附 注

作者简介：

A·Я·克利莫夫(1898—1970)——1918年加入苏共，远东革命运动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多次被捕，在白匪后方从事地下工作。曾任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滨海革命指挥部书记。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部毕业之后在中国工作(1924—1927年)；起初任国民军第二军顾问，后任驻张家口领事。从中国回国后领导过远东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以后调到外交部工作。后来几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历史学副博士。

A·Я·克利莫夫的回忆录是根据他1964年1月在苏联老战士委员会的讲话录音整理的。

①溥仪(1906—1967)是1911—191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推翻的，自十七世纪起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年号宣统)。随后几年由各军阀集团供养。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溥仪被日本人封为“最高执政”，不久又被封为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8月关东军被歼后，溥仪为苏军俘获，作为战俘在苏联度过了将近五年。1950年7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请求，溥仪和他的侍从以及原伪满洲国政府的成员被一并移交中国。见：《我的前半生。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录》(莫斯科，1968年版，译自中文)。

②有关A·И·格克尔详见：A·B·勃拉戈达托夫的《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年》，莫斯科，1970年版，第20—21页。

③Л·М·加拉罕(1889—1937)——苏联著名的外交家，1924—1926年任驻中国全权代表。详见：M·C·贾比才的《列夫·加拉罕》，载于《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一书，莫斯科，1970年版，第5—21页。

④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要求援助的人。1924年12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他在开封的官邸去。后来他派出正式代表团同加拉罕大使进行谈判。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

⑤攻克洛阳是中国军队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在中国北方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禀报这一胜利，胡景翼给孙中山拍发了私人电报。

⑥“红枪会”起于二十年代初期，是与军阀的横行霸道作斗争的一个农民自卫组织。它固有传统的中国秘密社团和帮会的许多特点，如入会者务须经过专门的训练——祈祷，喝浸过符咒的生水，炼得一副好身板。经过这些训练之后，会员就被认为刀枪不入了。

“红枪会”同河南国民军第二军之间的关系，于1925年底到1926年初紧张起来，因为胡景翼的继承人岳维峻将军因准备同张作霖开战而加征特别税，并强行摊派给养，以致引起了1926年1月“红枪会”举事反对国民军第二军。这次举事对华北的政治斗争影响甚大。

⑦1923年2月，吴佩孚击溃了工会组织，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

⑧白朗领导的起义（1912—1914年）史称“白朗起义”，是1912年夏季河南省内掀起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起义乃是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农村阶级斗争激化的明证。后来，它合进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义举。1914年3月遭镇压。详见E·A·贝洛夫的文章：《白朗领导下的中国农民起义（1912—1914年）》，载《历史问题》，1960年，第2期，第167—180页。

⑨岳维峻——国民军第二军的一员将领，胡景翼逝世后任该军军长兼河南省督办。1926年2月，国民军第二军因败于吴佩孚的军队，旋不复存在。

⑩A·Я·克利莫夫的讲话录音至此中断。

（元吟译）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

C·H·纳乌莫夫

我于1925年4月到中国。在莫斯科，我们小组由B·K·普特纳^①培训。他不仅常常招待我，而且凡派在他手下的人都招待。除普特纳之外，从事这一工作的还有A·Я·拉品^②，他担任参谋长的职务。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用了好几个月。普特纳小组分两批从莫斯科启程。一批去满洲里，而另一批拟取道乌兰巴托。我属于第二批。

此行颇为不易。我们坐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特别快车到乌兰-乌德（当时叫上乌金斯克）。在上乌金斯克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耽搁了一个星期。后来只好坐雪橇走了一段。那是严冬季节，我们几个同志的腿脚都冻坏了。总共用了五、六个昼夜才到达乌兰巴托。

在乌兰巴托滞留了十来天。又出现了交通问题——我们要越过戈壁沙漠。有几个人半真半假建议装备一个骆驼队。自然，这个方案没有成立。决定继续坐车前进——乌兰巴托和张家口之间有公路可通。但起初车子不够，因为原来我们想全组一起走；这样安全些，据说那时候公路上还有白匪出没。

不久，搞到了必要数量的汽车，我们乘车穿越整个沙漠，抵达了中蒙边界。离边境不远处，有冯玉祥专门派来的

小分队在迎接我们，以护送我们行进。中国人得到情报，说白匪企图在某个地方截击我们。结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诚然，有人曾发现远处有骑兵侦察班，但这些骑兵侦察班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头也没有弄清楚。在护送队的伴送下我们抵达了当时冯玉祥元帅的大本营所在地张家口。

很自然，在我们抵达之后的最初几天，国民军第一军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政工人员将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坦率地说，我们很快也就明白了，在冯玉祥的军队里，除去宣传基督教（因为元帅本人信基督教）之外，什么政治工作也不开展。各部队都有一批传教士。士兵清早起来要做祷告，晚上睡觉前要唱赞美诗。传教士给士兵们灌输基督教教义。

当B·K·普特纳把我们介绍给冯玉祥，说这些同志是组织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专家时，元帅立即答道，“啊，这么说，你们是想开导我的兵了？这种工作我们倒是也一般地搞一搞”。他按一下铃，进来一个人，元帅跟他耳语了几句，几分钟后有两三个人来到屋子里。看来都是牧师。冯玉祥声称：“就是这几个人在我们这里干你们准备干的那种工作”。我们明白，这就表明他们不需要我们效劳。所需要的是通讯、炮兵、步兵方面的顾问，而不是政工人员。

然而，普特纳还是作了试探，总想把我们留下，后来谈妥了：在国民军第一军的几个最大的部队里将组织驻军俱乐部，开展“对于上述工作之辅助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计划之内的事。

应当指出，在这些俱乐部里已有中国共产党员在积极地工作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跟杰夏特钦科和巴库林最终还是留在了这些俱乐部里，并找了些